



自杀性爆炸

图片提供：本刊资料室

会不会从极端变成主流？

□ 李刚

无论是对以色列还是对巴勒斯坦来说，4月16日都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9年前的今天，22岁的巴勒斯坦青年萨拉·特曼·那布尔斯在一辆白色三菱卡

车上装上煤气罐，在乘客座位上放上一本《古兰经》，然后就驾车冲向了两辆公共汽车，结果在剧烈的爆炸声中一名巴勒斯坦人丧生、7名以色列人受伤。当然，那布尔斯自己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让他感到愤怒和绝望的世界。

这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自杀性爆炸事件。当时，人们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这起事件所预示的真正意义，事件发生数天之后的《耶路撒冷邮报》还以冷静的口吻报道说，这起攻击“显然是自杀性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当时





■ 以色列少女为她们无辜被害的同胞而悲痛万分。

的人们显然还无法预料，自此以后短短的9年里，这样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已发生了106起，夺去了345人的生命。

自杀性爆炸成为反抗的最后手段

自杀性爆炸，在今天几乎成了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人方式的代名词。自那布尔斯首次对以色列人使用自杀性爆炸攻击方式以来，人们习惯于这样勾勒自杀性爆炸者的形象：男性，年龄在17岁到22岁之间，未婚，无固定职业，对前途感到失望，有强烈的宗教狂热情绪，深信伊斯兰教义中关于烈士可以进入天堂的描述。但是，这只是代表了早期的自杀性爆炸者的形象，在今天这样的描述已经不适合他们了。今天，“他”可能是伊萨丁·马斯里，一个富裕的饭店老板23岁的儿子，他在耶路撒冷以自杀性的方式杀死了15人和他自己；“他”也可能是多龙得·阿布·斯威，一位47岁的8个孩子的父亲，在外人看来，他并无异常的政治追求和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于去年12月在耶路撒冷一家高级饭店门口以自杀性的方式夺走了自己和另外两个人的生命；“他”甚至可能是女性，阿雅特·阿克纳斯是一名18岁的门丁功课优秀的女学生，在3月29日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并与心爱的人结婚的时候，她在耶路撒冷一家超市里引爆了绑在自己身上的炸

弹……自愿从事自杀性爆炸活动的人越来越多，构成也越来越复杂。

在巴勒斯坦人中间，用自杀性爆炸来对付以色列人，不但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是高尚的。通过牺牲自己来消灭敌人，不但可以实现复仇，而且可以带来尊严。美国专门研究约旦河西岸自杀性爆炸事件的心理学家杰罗德·普斯德说：“这种以前曾经是少数极端团体进行的个人行动，正在变成巴勒斯坦人越来越主流的选择。”处于悲愤和绝望之中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越来越多地把通过牺牲自己消灭敌人视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手段。去年7月在加沙地带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8%的人支持对以色列人进行自杀性爆炸袭击，明显地高于支持进行和平谈判的60%的支持率。

当活着已经没有意义

在1993年第一起自杀性爆炸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年里，要想招募到自愿进行自杀性爆炸袭击的人并不是很容易。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得从各地的清真寺和以色列各种检查站旁骚乱的人群中挑选

合适的人选，然后他们对挑中的人选进行集中的精神教导和军事训练，并时刻注意观察是否出现恐慌和怀疑情绪，那些动摇者将被淘汰。

在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以后，巴勒斯坦人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开始憧憬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对暴力活动也较多地进行了自我限制。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只有极少数的人仍认可自杀性爆炸活动。这样，自杀性爆炸活动只在极少数顽固坚持其极端信仰的原教旨主义者中还有市场，这些人坚持认为，和以色列达成的任何和平都是可耻的。

从2000年夏季开始，随着和平进程的打破以及同年9月开始的不断加剧的流血冲突，巴勒斯坦人的希望渐渐变成了绝望，越来越多希望成为“烈士”的人加入了哈马斯，而且大部分人是自愿的。哈马斯的高级官员阿布德尔·阿齐兹·兰提斯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电视新闻是最有力的宣传武器，当你不断地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同胞的葬礼，看到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平民被屠杀，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的悲情就会分外的强烈。”

从事自杀性爆炸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不断增多，已经超出了原教旨主义者的范畴。以色列多学科研究中心的政治学家爱

■ 面对汹汹自杀性爆炸浪潮，沙龙的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华德·斯宾扎克认为，“在过去短短的一年中，在巴勒斯坦社会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使是那些宗教信仰不是很强烈的人，也赞同进行自杀性爆炸袭击。在巴勒斯坦社会存在着空前的失望，甚至是绝望。活着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

对于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的目标跟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是有区别的，他们并不是要消灭以色列，他们只希望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以色列平等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在由于局势发展的恶性循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战略正日渐趋同，即尽可能地杀死或伤害更多的以色列人，以使他们感到恐惧并丧失士气。

在过去的18个月里，进行自杀性爆炸袭击的成功几率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这是因为，这些自杀性袭击者大都是自愿的，他们并不需要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动员和教导，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很大的提高。每一次袭击行动除了爆炸者外，还要涉及到其他5到6名参与策划和支持人员，他们并不会在爆炸中丧生，而是可以多次参加活动并且经验越来越老练。他们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主要有侦察员、警戒员、司机、爆破技术人员、电工和金属加工人员等。

“死亡文化”中的悲情

每一次自杀性爆炸案发生以后，巴勒斯坦人的心情是复杂和耐人寻味的，很难用语言准确地形容出来。

巴勒斯坦人会在报纸上刊登读起来像是婚礼通告似的广告。当3月30日22岁的安曼·海弗斯·萨达特以自杀性爆炸方式杀死4名以色列人之后，他的家人在报纸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杰瓦德和阿萨德家族以及他们在西岸的亲戚为他们儿子的壮烈行为感到骄傲，安曼·海弗斯·萨达特烈士不朽。”但这种感情并不能持久。伊雅德·萨拉吉是巴勒斯坦一名专门研究自杀性攻击现象的心理学家，他说自杀者的家人最初为孩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但大约6个月后，悲痛就笼罩了一切。

在每成功地进行一次爆炸后，策划和发起爆炸的组织通常会向新闻媒体提供一盘录像带，记录自杀性爆炸者最后的、往往是慷慨激昂的言辞。这些组织将负责安排葬礼的一切事宜，通常会在死者住宅的附近搭起一个帐篷，以供死者的邻居和亲属前来吊唁。哈马斯会给死者的父母提供永久性的养老金，大约为每个月300到600美元，此外还给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保障，并负责给其子女提供必要的教育。为了表示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4月9日宣布，将给自杀性爆炸者家属的一次性抚恤金由10000美元增加到25000美元。

在巴勒斯坦儿童中流行着一种叫“成为烈士”的游戏。在游戏中，“烈士”要将自己埋到坟墓中，那样他活着的家人将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并获得一定数额的现金和卫生医疗方面的保障。“虽然对烈士这个词，他们可能说不上是什么的涵义，但他们依然梦想着成为烈士。”巴勒斯坦一

所难民营小学的校长说，“他们从电视上和街头的宣传栏里得知，烈士的家庭受到怎样的尊重，于是他们想为自己、为家人赢得类似的荣耀。”当同龄的孩子只能在电脑游戏中才能体会到什么叫仇恨和复仇时，巴勒斯坦儿童却不得不在现实中过早地用他们幼稚的心灵来体会其中的艰涩。美国兰德公司的恐怖主义专家布鲁斯·霍夫曼说：“那些自杀性爆炸组织取得了恐怖组织多年来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效果，他们使这种自杀性爆炸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再仅仅依靠几个强硬的核心人物，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随时准备为消灭敌人而牺牲自己。”不可否认，在中东地区，自杀性爆炸者的理念已经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甚至有学者认为，在部分人群中已经产生了一种“死亡文化”和“死亡崇拜”。

不对称条件下的“无奈”选择？

其实，与一般人的认识相反，中东并不是自杀性攻击的发源地。在当代社会，最臭名昭著的自杀性攻击活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神风敢死队。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组织为了建立一个分离的独立国家，正在跟斯里兰卡政府进行战斗，他们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手段和频率并不比世界上任何地区逊色。迄今为止，他们已发起了大约200起自杀性攻击，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因此可以说，自杀性攻击并不是巴勒斯坦人的专利，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民族都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其



特定的政治目的。中东地区的第一起自杀性爆炸袭击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肇事者是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尽管如此，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攻击活动由于它的规模庞大和影响空前，是最应引起世人关注和警醒的。

一些温和派的伊斯兰传教士认为，自杀性袭击是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相违背的，因为穆罕默德明确表示反对自杀。还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如果是为了自卫而进行自杀性攻击，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哈马斯第二号领导人穆萨·阿布·马佐克在秘密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进行自杀的人是对生命的逃避，这是为伊斯兰教义所禁止的。但是，为了自卫而进行自杀性爆炸的烈士，却不是对生命的逃避，他们是在为子孙后代创造未来。”他认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杀死以色列人，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自卫行为，因为以色列人占领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正当的民族权利，并经常对巴勒斯坦平民滥用暴力。

这一逻辑不能说没有说服力，因此2002年4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有57个穆斯林国家参加的伊斯兰大会在界定恐怖主义的定义时，将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性爆炸活动排除在外。马佐克说：“恐怖主义的定义并不适用于那些领土被占的民族。对于占领者来说，穿着军装还是平民的衣服，区别并不很重要。如果一个人穿着平民的服装，但他却带着枪，强占了我的房屋、我的土地和正当权利，我能说因为他是平民而不应该遭到报复吗？”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并不放弃使用自杀性爆炸活动，也许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即它一直在发挥着作用，而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人的有效手段并不多。就加强斗争中弱势一方的力量并动摇以色列社会的基础的目标来说，自杀性爆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按照正常的逻辑，巴勒斯坦人也希望通过正常的军事手段与以色列对抗，在军队与军队进行战争，但现实是巴勒斯坦人并没有真正的军队。他们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火炮，只有零星的几支配备有机枪的民兵，即使把哈马斯的非法武装计算在内，也仅有少

量的迫击炮和火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根本都无法跟以色列相提并论。

此外，自杀性爆炸组织也深知，他们的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以色列的报复，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同时也使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和事业获得了全球范围内广泛同情。马佐克说：“我们现在听到了联合国的声音和许多国家的呼吁，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军，允许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如果巴勒斯坦人没有采取包括自杀性爆炸在内的反抗行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其他手段的无效，巴勒斯坦人不得不



更加重视和依赖自杀性爆炸袭击。巴以和平进程的协调人之一塞米尔·兰提斯在谴责针对平民的攻击的同时也认为，这些行为是一个民族绝望和无奈心理的产物。他说：“35年来，为了结束敌人的占领，巴勒斯坦人试过了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方法，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他们试图与以色列人共存，但没用；他们试图通过抗议示威达到目的，但没用；他们通过秘密谈判达成了奥斯陆协议并以为最终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还是没用。”

母亲何时不再哭泣？

对于如何最终消除自杀性爆炸袭击，各国的政治家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是彻底清除支持自杀性爆炸袭击的组织 and 人员？还是给那些希望以死亡与命运抗争的人以更多的理由活下去，而不是寻求以死亡去抗争？就目前来讲，以色列现政府采取的显然是前一种对策，首先是摧毁进行这类活动的基础设施，同时将目标瞄准那些支持自杀性袭击的军事领导人和武器制

造者，并寻求将他们彻底消灭。

但是，沙龙政府这一政策却很难奏效。由于自愿从事自杀性爆炸活动的巴勒斯坦平民越来越多，他们并不需要固定的基础设施，也不需要专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即使是炸弹制造者也并不一定需要专业人员来担任。只要他们愿意，几乎可以随时随地向以色列人发起攻击。而且由于以色列人的镇压行动，只能激起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拿起自杀性爆炸这个唯一有效的抗争武器。例如，以色列军队在1月22日成功地暗杀了一名哈马斯的炸弹制造专家，结果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招致了更多的报复性爆炸袭击。以色列安全部门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放弃了进一步的暗杀计划。马佐克称，“自杀性爆炸袭击根本不可能通过镇压的方式被消灭，当一个人决心当一名烈士时，他的行动计划谁也阻止不了。”以色列过去所奉行的政策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忍受以色列人强硬的报复行动所产生的悲愤后果的同时，以色列人也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肉体毁伤的恐惧和丧失亲人的痛苦之中。艾布提萨姆·达拉格姆是一位普通的巴勒斯坦母亲，她常常会盯着那些她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的孩子们的身影发呆。这些孩子们手里拿的不是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拿的玩具，而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不是坐在课堂上接受应该受到的知识的熏陶，而是在进行着令他们身心疲惫的军事训练；他们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欢乐和憧憬，而是绝望和仇恨。看着他们，艾布提萨姆常常会想起自己19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他在3月2日走到一群抱着孩子的以色列妇女的身边，拉响了绑在自己腰上的炸弹……

两个星期后，一位邻居来到她家中对她表示安慰，并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成为穆罕默德那样的英雄，这样她会为自己是烈士的母亲而感到骄傲。艾布提萨姆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她说：“巴勒斯坦人的母亲和以色列人的母亲一样，都在承担着痛苦。母亲的心都是相通的。我们都很无奈，我们只能痛哭。”

